

觅“政”之途：夹缝时代中的学人与学科求索^{*}

——以近代留美政治学人张忠绶为个案之探讨

张睦楚^{**}

摘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及创立，促进了中国政治价值、话语及思维从传统向现代的根本性转换，并促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及价值观念、政治话语及治国思维从传统向现代的迅速转换。政治学人作为学科知识分子中的代表者或最优者，同时也是学科发展中有社会影响或在某一方面对社会的关怀表现极为特殊的知识分子，是学科实践活动中的创建者、活跃分子和极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从实质上来看，学人与学科两者隶属不同的领域，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复杂交错的问题，主要体现为近代学人个体大多在近代风云变幻的牵制之下努力寻找一种学人与学科理想及现实之间互动的“最近发展区”。因而，本研究以政治学人对学科求索的个案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近代政治学科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探寻近代政治学人如何不断塑造自我的学科观点、凝聚自我的学科目标、强化自我的学科信仰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求索虽然未能涵盖整体的学科问题，但却足以折射出近代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学）课题“异域想象与自我审视：近代西方公众视野下留美中国学生形象研究（1879—1949）”（项目号：XOA18029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6批面上资助“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近代留美中国学生在美政治活动研究（1909—1937）”（项目号：2019M662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张睦楚，教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云岭“千人计划”青年学者、联大青年英才学者，主要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比较高等教育、教育史研究。

“政治变迁”与“学人一生”的双向互动命运。

关键词：留美学生；政治学人；政治学科；学科互动；留学教育史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scholars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iscipline, on the one hand, was conducive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iplin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a kind of positioning, a kind of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of the position, role, status and relationship of self-study disciplin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r the best among the subject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scholars are the intellectuals who have social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or show special concern for the society in a certain aspect. They are the founders, activists and influential representative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subject. Due to the fact that scholars and disciplines belong to the same field in essence,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interlocked problems inevitably aris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most individuals of modern scholars are trying to find a “zone of recent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scholars and disciplines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modern vicissitudes. Also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shape self-discipline idea unceasingly, condensed the discipline target and to strengthen the self-discipline of self-belief, therefore change period in modern China political economist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discipline, is enough to reflect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discipline life” two-way fate.

Key words: Educated-Students in America, Political Scholars, Political discipline, Discipline interaction, History of overseas education

一、引言

我国近代以来各学科的发展历程，一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相。这一时

期，各学科学人或是负笈留洋，或是立足本土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无疑推动了各学科的发展。从近代历程变迁来看，正是由于学人与学科两者实质上所隶属不同而又有所关联的领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复杂交错的问题，这种复杂的张力投射在留美学生个体层面，则体现为近代学人个体大多对“学科”与“个人”的双向关系有着紧张而又复杂的心灵体验，在近代风云变幻的牵制之下努力寻找一种学人与学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互动的“最近发展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人与学科的互动，倘若没有学人对学科的推动、学科对学人的反向作用，就谈不上学科的完整；但凡一类学科，必然离不开所属学科学人对其的建设、思考及认同，某些层面有妥协甚至有理念的纠缠，否则学科即失却了存在的价值，倘若失去了对学科的各种“观照”，学人自然也失去自身职业心灵依靠的“港湾”。因此，以“学科-学人”互动为描述单位，兼顾人事、历史政治制度等诸因素，或是动态把握学人与其学科的动态发展脉络，是为了解其学科叙述史一大方便途径^①，当然，亦是本文成文的主要价值之所在。

二、“学科求索”的内涵与近代政治学科

（一）学人与学科求索的建构及理论基础

在做出“学科求索”的定义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学科”的内涵进行定义。一般而言，“学科”是指认知进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通常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学术组织及教学科目。按照华勒斯坦所言明的“学科”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一是指科学的分支或知识的分类，与“专业”的区别在于“学科”指向的主要是知识体系，而“专业”主要指向社会职业的领域；其二是指“教学的科目”，即教与学的科目，发挥着传递知识的教育功能；其三是指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开展教学和科研的组织单位，是对教师或科研人员教学范围的相对界定。^② 在考察了“学科”的内涵

^① 王东杰：《学术“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典范融合：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1924—1949）》，《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② 项建英：《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学科求索”的意义。从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来入手，所谓学科求索，其原意是指个体对自己从事学科的理想、信仰及情感趋向的一种较为一致和比较完满的意识体验，它代表着学科研究中主体人格成熟的一种状态，指个体综合当前自我、个性特征、社会期待、以往经验、现实环境及未来期望六个方面，将其统合为一个整体的人格结构，使个体对“我是谁？”“我将走向何方？”等问题不再有彷徨迷惘的感觉。

严格来看，“学科求索”与“学人学科求索”作为一个由“学科”与“求索”构成的并列词句，实际上包含了两重内容及含义：其一，“学科”主要指向学人与学科的双重个体；其二，“求索”则指向学人与学科的双向作用，由于每一种学科总是以某一文化系统为参照背景，以确立自我形象，因而学人的学科互动一方面与自身的学科实践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科整体发展的境况相关。按照尤纳斯·索尔蒂斯（Jonas F. Soltis）对学科一般性分析定义来看，但凡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能够充实他们的学术标准、收集和组织更多的证据、提出更好的理论，那么这门学科就不会仅“止步于”一门学科，而是会成为一门职业科目。^① 以上可见，“学科求索”的概念众说纷纭，很难确定一种全面且周到的解释。由此出发，从广义上来讲，所谓学人与学科互动即学人对于自己所从事之职业及志业的独立性、完整性、学术性、连续性的自我判断及自我意识甚至是自我觉醒，并进而对于自己作为该学科从业人员的职业使命、职业立场的自识与自觉。从狭义上来说，本文所要回答的“学科求索”等问题，具体指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科求索”指的是独立自主的学人对学科研究的承继、学科的研究、从实践层面对学科进行的演练及主观上对学科的归属；其二，在此基础上，学人如何进一步推动既有学科发展的延展及在某个层面对学科有创造性或特殊的理论创生；其三，学人的学科互动并非单向的“学人-学科”作用，更是指学科在多大程度上“滋养”了学科学人的精神面貌，塑造了学人的精神心灵，勾画了学人一生的生命轨迹。具体到政治学学人而言，所谓学科互动即是政治学家对于自我政治身份、学术研究身份的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自我验证（self-identity）、自我意象（self-image）、自我观念（self-concept）、自我展现（self-expression）

① Soltis, Jonas F.,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Boston: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 137.

等，同时亦是对他人关于国际政治、政治研究、政治学科教学等评价的反思性意识。

（二）近代政治学科及政治学人

对于学科的考察，需要从学人与学科的视角入手而进行必要的检视。回顾近代特殊时代下学人的学科求索，可谓学科众多、学人众多，无法面面俱到，因此本研究拟选择政治学人对学科的求索视角进行相关讨论。^①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端及创立，促进了中国政治价值、话语及思维从传统向现代的根本性转换，并促使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及价值观念、政治话语及治国思维从传统向现代迅速转换，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研习政治和为政之要的传统学术逻辑。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抗战全面爆发时期，民国教育非但未毁于战火，反而稳步发展并趋于定型，彼时国内局势相对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造就了近代大学的鼎盛时期，尤其是1929年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等相关政策，对全国大学进行了统辖及改组，并改原先的“科”“门”为院、系，在这10年当中，中国的高校数量、学生人数、经费投入、教育质量与学科完备程度均相对达到了民国时期的较高水平。1932年后，全国已有近30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在初创时期所形成的学科范式、制度路径、知识结构及课程体系广泛影响了中国近代

① 现今学术界对近代政治学尤其是近代留美政治学人的关注是从整体上梳理入手的，并结合断代及专题角度来研究的。相关代表性专著成果有1998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编：《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史（1898—1998年）》；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李贵连：《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代表性学术论文方面有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孙宏云：《浦薛凤“政治五因素”论的形成与展开——兼论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史上的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张允起：《“宪政的伦理基础——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及其西方宪政思想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04年第3期；孙青：《“西政”与“中学”：西方政治学“影像”在中国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杨海蛟、元光：《中国政治学30年》，《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刘超《清华学人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从罗家伦、蒋廷黻到郭廷以、邵循正、费正清》，《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钱元强：《留美与近代中国政治学》，见俞可平主编：《北大政治学评论》第5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王浦劬：《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全国高校的政治学科。^①对政治学科而言，此后南京国民政府对高等学校政治学系的课程设置又接续已有规定，规定学科目的不仅在于培养文官人才，对如何促使学生具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和独立思考、深入研究的能力亦应特别注重。^②其中，以北大为代表的各高校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创立，更是启动了现代政治学科的创立及发展的航程。

在此种社会背景以及学科建制的转换之下，政治学人与所属学科的互动问题亟须关切。所谓政治学人即为学科知识分子中的代表者或最优者，同时在学科发展有社会影响或在某一方面对社会的关怀表现极为特殊的知识分子，是在学科实践活动中的创建者、活跃分子及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由知识分子转型而来同时保留着较多的知识分子特征的学科主力。政治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中国的政治学家最先接受欧美政治学训练，或是在国内政治学系所中接受专业训练，以张忠绶、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浦薛凤、陈之迈、张佛泉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政治学家，大多出身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③这部分学人大多于20世纪20—30年代在欧美获得政治学学位，兼具欧美新兴学术思想及旧学功底，归国后成为各主流大学政治学系教员，且为国民政府时期“学政”交流、讨论国是的主要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倾向于民主政治，在教学上倾向于“学研结合”，在国家外交主旨上倾向于尊重国际外交规则及政策同时寻求积极外交途径，在思想情感方面倾向于理智式同情国家现状并深切理解国家困境产生因素，因而可以说这一群体一方面具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深厚民族感情，另一方面也抱有法理性地、实际地探求新国家建造的新理念。

在这群留美政治学人中，尤以张忠绶为代表。虽然对于学术界而言，他是被时代“遗忘的”，但仍然是“值得讨论的”。留美政治学人张忠绶（1901—1977），字子纓，他是典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生都在探寻实现政治外交救国的机会；同时，作为一位政治教育家，他兼顾了西方政治外交理念与中国国家意识，在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中采取超然态度，试图从各方面提出国家当前发展的各大要务，真正地从国家治理革新及优化方面解决国家

① 王浦劬：《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② 吴其玉：《徐淑希先生和燕大政治学系》，见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③ 王向民：《学科与学术：中国20世纪30年代政治学的建立》，《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72页。

问题。^①然而对于他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大多仅从政治学人从政于政治界入手，或是从大学史、学科史角度入手，旨在探寻其在政治学科方面的成就；抑或是从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入手，阐述政治学留学生博士论文海外评价；从期刊论争入手，探究“外蒙撤治”等诸问题。^②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只关注到彼时张忠绶对国际外交关系、英日同盟与德意日同盟、美国与远东政策、国联问题、外蒙问题、留学教育等诸问题的学术研究讨论，对其一生中与政治学学科互动的实践与理念则缺乏深入的学理性研究。然而从通俗意义上来说，以他为代表的政治学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有助于串起一个“不一样”的政治学人的学科求索史。因而，研究以政治学人对本学科求索的个案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近代学人与学科的互动、近代政治学人对本学科的求索历程以及近代政治学科

① 张忠绶：《政治力量与行政效率》，见智效民编：《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 (1) 从政治学人从政于政治界等诸问题入手的代表性研究有任骏：《英国海雷勋爵在太平洋学会会议上演讲及张忠绶拟对策方案》，《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罗珍：《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知识界外交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欧阳军喜：《论五四运动与清华》，《安徽史学》2012年第6期；王榕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尚小明：《“二十一条”交涉的另一条管道——总统府相关活动透视》，《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鲁卫东：《“国难”时期学者的两难困境》，《学术界》2012年第8期；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尹智博、左双文：《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的虚弱大国——以国民政府的困境与失误为视角》，《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岳谦厚：《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孙宏云：《行政效率研究会与抗战前的行政效率运动》，《史学月刊》2010年第5期。(2) 从大学史、学科史角度入手，旨在探寻其在政治学科方面的成就的代表性成果有韩立云：《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王春林：《“知识与权力配合”：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大学和地方势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桂运奇：《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现代政治学科的建立及初步发展（1898—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朱梅光：《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王向民：《学科与学术：中国20世纪30年代政治学的建立》，《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桂运奇：《政治学的中国适应：国民政府初期行政学在北京大学的兴起》，《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3) 从博士学位论文方面入手的研究有元青、张连义：《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海外评价——以留美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4) 以期刊论争入手，探究“外蒙撤治”问题的研究有冯建勇：《1919年外蒙撤治事：功过孰论？——〈独立评论〉关于“外蒙撤治”的一场论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此外，关于张忠绶人物生平介绍亦可详见：刘超：《“熟悉的陌生人”》，《书屋》2010年第2期。

的发展历程，也有助于探寻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政治学人如何不断塑造自我的学科观点、凝聚自我的学科目标、强化自我的学科信仰等一系列问题。这一求索虽然未能涵盖整体的学科问题，但却足以折射出近代“政治变迁”与“学人一生”的双向互动命运。

三、觅“政”之途：夹缝时代下的政治人生及其求索实践

（一）学于域外：留美生涯与学科的初步实践

政治学人张忠绂出生在一个日渐没落的旧式书香人家，先祖于明末清初由陕西南迁，定居在湖北省武昌城内粮道街仪凤巷内。据他在回忆录中记述，“曾祖父曾因战功升至云贵总督，叔祖于十四岁入学，联捷后于二十岁即点翰林，后升为御史、侍郎。八国联军入侵时，全家逃出京城，仅以身免，父辈从此即无意于仕途，只任督抚幕僚与湖北省存古学堂堂长。民国以后，回武昌任鄂省通志局局长，不再与仕途发生关系，而依然沿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张忠绂四岁即始就学，1913年春入武昌高家巷文华中学，1915年夏入公立北京清华学校。在学期间，多次参加英语语言说辩论会，展现了出色的外交才能，同时他也参加了清华政治学研究会。清华政治学研究会是由清华高等科同学10余人组织的政治学专门研究会，该会成立于1920年，以“纠合同志，公共讨论及研究切有关于政治之问题：一为扩充公民智识提倡公民责任；一为将来肄业专科中预备起见”为宗旨，以讨论会、请名人演讲政治学理论及各国政情、模拟法庭演习^①、进行政治学辩论等方式展开活动。清华政治学专门研究会的成员除张忠绂外，亦有吴国桢、浦薛凤、胡敦元、翟恒、李迪俊、王化成、梁朝威等，可以说在学生时代他对于政治学的研究是在各类学生活动中逐步获得感性

^① 据《清华周刊》第九次增刊（1923年6月）刊载的《学生方面：一年来课外作业记》的记载：“清华学生法庭：本学年学生法庭职员，迟至去年（1922年）十一月初始行选出。审判部为施滉、张忠绂、冀朝鼎三君，法庭检查部为李迪俊、胡毅、何鸿烈三君。（1922年）十一月七日两部职员正式在大礼堂宣誓就职。”

认知的。^①此后，张忠绂于1922年应商务印书馆暑期学生编辑招考，寄送汉译英及英译汉的文字各一篇，最终又成功选为该馆编辑，加入了商务印书馆“智识丛书”的编译工作。

1923年夏，张忠绂于公立清华学校毕业后，由上海搭乘杰克逊总统号（S. S. President Jackson）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密苏里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政治系学习，获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专修国际法及政治学。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就学期间，张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此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后，在战胜国集团为了解决战争的遗留问题以及奠定战后和平而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以部分留美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团将一份争取中国国家主权的和约方案向大会提出，却遭到了驳回，这种不顾中国国家尊严的蔑视与欺辱，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也将中华民族的全部尊严无情撕碎。中国虽为战胜国，但是在山东问题上却依然没有收回相应的合理权益，这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神经”。随着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的失败，一种激烈的民族意识迅速扩展到了整个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留学生，留美学生虽然身处大洋彼岸，但强烈的民族情绪丝毫不减。与全体国民相同，留美中国学生无不忧思国家未来，寻求救亡图存道路，这种民族意识构成了他们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凭籍。为了探讨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的相关问题，留学生加大了组织抗日救国相关活动的频次，整个留美学界也弥漫着一种慷慨激昂的救国情绪。面对棘手的山东问题，就爱国的方式以及留学生该如何爱国的种种问题，留美学生在美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属于这一群体的声音，在各类活动中积极出谋献策、力陈观点，他们或是通过演说宣讲、刊发评论，或是通过组建相关事务委员会、与其他团体的合作等方式，表达着对这一事态的密切关注。张忠绂在代表作《中华民国外交史》中则详细阐述了“一战”后的中国国家与“威尔逊主义”，他认为中国对华盛顿会议之期望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望各国不再乘中国内乱之机会损害中国独立国家之权利；其二，撤销各项有害于中国主权之行动；其三，应将先置中国向西方游说行动的若干现存条约

^①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2—263页。

加以修正。^①他指出美国总统威尔逊为大学教授出身，实为一大理想政治家，旨在以为世界建设永久和平为办法，以“民族自决”解决国际之纠纷，以国联保障各国之安全。恰逢此时中国派陆徵祥（时任外长，于1918年12月1日启程赴美）、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王正廷（时在美国代表南方军政府之利益）为中国出席代表，其中以陆徵祥任首席代表。^②巴黎和会上讨论山东问题，威尔逊于国际问题的陈义较高，正式宣称希望列强能够放弃其特殊地位，日本政府也放弃日本在华之特殊利益，有助于解决山东问题。^③

为了寻求留学生在国家危难时刻所应采取的救国方式，1926年举行的中部留美学生夏季年会，遂以“国家主义与中国”为议题，供全体留学生讨论。该年年会在哈佛大学举行，特由留学生联合会书记张忠绂做该次会议记录。根据会议主题共分为四个小组讨论，第一组于1926年9月5日举行，题为“中华民国之国家主义”，主讲人为留美学生代表罗隆基。罗氏认

① 张忠绂：《中华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426页。

② 张忠绂：《欧洲外交史》，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195页。

③ “一战”期间协约国彼此虽然订有种种密约，但美国并未与他国签订任何密约，因此在巴黎和会席间并未受任何协约所束缚，彼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一大理想政治家，力主战后国际关系应为人类谋真正幸福、为世界谋求永久和平之基础，不应以各国之私利为前提。威尔逊具体主张见于“十四条”：（1）外交公开，合约公开；（2）海上航行绝对自由；（3）除去一切经济之障碍，建立平等的商务状况；（4）各国交换保障彼此之安全，缩减军备使之足以保障各国国内之安全为止；（5）对于处分一切殖民地不应存自私之念，应顾及各殖民地居民之权益；（6）俄国境内之外国军队应撤退，凡有关俄国之问题应以不干涉俄国内政依据俄国人民之意愿；（7）比利时境内之外国军队一概须撤退，比利时应恢复其领土，其主权不应受任何限制；（8）法国被地方侵占之领土应物归故主；（9）重划分意大利之边境，以民族为分配之原则；（10）奥、匈两国之人民应有自由发展之机会；（11）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境内之外国军队应撤退；（12）土耳其帝国之土耳其部分应获得完整之主权；（13）建立一独立的波兰国家，其领土应包括一切波兰民族居住之区域；（14）组织以国际联合会，使世界各国相互保障彼此之政治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张忠绂：《欧洲外交史》，世界书局1934年版。根据张忠绂于《巴黎会议期中中国之外交》中所述，当巴黎和会开会之初，中国因列国均已承认以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为休战之基础，且有意借和会召开的机会一举解除中国于过去所受的一些外交束缚与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一完全自由平等之国家。和会既开之后，英、法、意、日等国实际上无意遵守其诺言，并不愿以“十四条”为和议之基础，因而中国有关山东问题及民四条约之交涉均告完全失败。中国所要求之取消外人在华享有的一切特殊权利亦未能达到目的，仅获得列强允诺此问题可俟国联行政院成立之后提交该院讨论。可以说中国在和会中所提出的具体主张虽大多未能达到，但中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已因和会之经过而引起全球人士之注意，预伏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之处置之张本，且德、奥等战败国在中国之特殊利益均已取消，是以巴黎和会对于中国之处置虽未能使中国满意，但中国已因巴黎会议而获得相当之结果当无异议。张忠绂：《巴黎会议期中中国之外交》，《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第3期，1936年。

为“中华民国当谓国家主义为抵抗帝国主义唯一而有力之利器，非采取国家主义，不足以图存”。随后第二组、第三组讨论分别于9月7日及8日举行，由清华留美学生代表时昭瀛及何浩若分别主讲。前者认为国家应立即收回中国国权与政治上的损失，例如收回驻屯军队及警察权、北京公使馆区域限制、领事裁判权、西藏蒙古之条约、租界及租借地，以挽回祖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尊严；后者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及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是侵略中国的基本原动力，因此要极力废除。^①三日之后，第四组讨论会由学生代表翟恒主讲“国家主义之实施”议题，议题提出要使中国顺利完成国家主义化，必须对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同时国家还必须实行国家主义化的教育。^②留学生于国家危难之际在美积极举行的各界会议，均寄希望于“能发生若干力量，去救济这残破不堪的国事，达到最高之理想的境地”^③。纵观这些留学生域外早期政治活动的开展，据张忠绂回忆“可谓有声有色、令人印象深刻”，体现出了留学生期望通过彼此的相互联合，广而推之为一致的团结，采“政治”对救国问题发挥作用。

1927年秋，张忠绂获硕士学位，当年即转到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为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研究院之一，汇聚了众多知名的学者教授，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政治系。彼时政治系有两位出类拔萃的学者，一位是校长古德诺（Prof. Frank Jackson Goodnow）^④，另一位则是政治系主任韦罗壁教授（Prof. W. W. Willoughby），张忠绂跟随后者开展学术研究。韦罗壁作为当时美国学界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曾长期担任北洋政府顾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长期担任中国驻美国、驻国联使领馆外交顾问，在美国乃至世界外交学术界具有一定地位。他既是美国知名的政治哲学家，亦是远东问题研究的权威学者，对于中国有

① 张忠绂：《中部留美学生年会报告》，《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1期，1926年，第159—162页。

② 张忠绂：《中部留美学生年会报告》，《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1期，1926年，第160页。

③ 卢孰竞：《对于北美洲中国学生会之感想及希望》，《留美中国学生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第28页。

④ 弗兰克·杰克逊·古德诺（1859—1939），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在美国阿姆斯特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879）及文学硕士学位（1887），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882）。1914年至1929年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先后教授行政法、历史和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并于1930年成为该学会第一任主席。1913年曾到北京任中国政府的宪法顾问，1915年发表《共和与民主论》及《比较行政法》。其中，《比较行政法》为其成名作，该书被译成世界各国语言，使得古德诺称誉全世界。

极其真挚的感情，对中国问题以及就学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学生，也总是怀有极其关切的态度。韦罗壁先生著有《外国在华的权利与利益》《中日冲突与国联》《中华宪法平议论》《中国与华盛顿会议》《中日纠纷与国联》等中国问题专著。值得注意的是，在《外国在华的权利与利益》一书中，他对中国的同情态度尤为明显，著作一方面“以客观与科学的态度进行阐述”；另一方面还对日本的立场尽量予以考虑，以免受人评论有所偏袒之故。但即便如此，韦罗壁的研究结论仍然是有利于中国的，不仅因为中国在中日冲突间占有“理”的成分，还因作者有着客观中立的正义感。^①

大致而言，韦罗壁的治学取向有两大特点：其一，力求站在历史中立的立场，强调论述客观公正不掺入著述者主观意图；其二，征引赡详，重视实用的中外文外交史料、条约、外交家日记信札等材料。^②《中日纠纷与国联》一书即是韦罗壁的代表作，也被美国学界视为中日关系研究的权威著作，全书“出之以科学的眼光、客观的态度，不以其个人受聘中国之关系（担任中国政府之顾问）而稍有所偏袒也”，所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语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可以说该书“以极公平之心抒正直之论”，被顾维钧评价为“精审详实，持论公允，脍炙人口”^③。韦氏另一著作《日本立场的研讨》一书中，则以客观与科学的态度对战时日本立场进行深入研讨，该书根据日本官方的宣言，阐明了日本在远东的真实目的，并进一步研讨日本追求此类目的的理由，以及日本在中国的大亚细亚政策，并附上严密的公约附录，如《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美致中国照会、美致日照会等。^④

张忠绂刚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注册半年后，经导师韦罗壁批准后，选定了“英日同盟”一题。随后他搬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附近写作论文，并每月回校一次，向导师报告研究的进度。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学

① 张忠绂：《书评〈日本立场的研讨〉》，《新经济》第4卷第7期，1940年。

② 《图书介绍：中华民国外交史》，《图书季刊》第5卷第2—3期，1944年。

③ 顾维钧：《序》，韦罗壁：《中日纠纷与国联》，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3页。

④ 张忠绂：《书评〈日本立场的研讨〉》，《新经济》第4卷第7期，1940年。

生作博士论文，常为了“取巧”而选择有关中国的题目^①，尤以教育学和文法学院学生为典型，张忠绂对留学生此种治学“取巧”取向不屑一顾，他即以《英日同盟》(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为名成博士论文，成书后由泰勒·丹内特(Prof. Tyler Dennett)、罗氏(Mr. F. E. Ross)、麦可米克(Mr. T. D. McCormick)给予指导意见。书稿终在1931年得以《英日同盟》(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之名出版，出版后反响较大，深受学界好评。威廉·兰格(William L. Langer)就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称赞张忠绂的论文“是对英日联盟最为科学的研究，特别关注到其与美国的关系”^②。该书出版后，导师泰勒·丹内特基于张忠绂对中国现实问题精准的把握，评价道：“一个中国学者确实很难像张忠绂一样公正客观地研究这一联盟，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对这一课题的新的理解，而且有非常广泛的资料搜集过程，从现代的著述到官方文献都包括其中。这对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生了解原始材料最简单不过，便于节省大量时间。”他认为没有人能像张忠绂一样深刻清晰地揭露了英国在中日战争前后在中国结

①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留美生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共计54篇，其中近20篇论文以英文原文形式在海内外特别是美国公开发表或出版，其中不少作品还多次再版。在这些作品中，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博士论文有严恩椿：《门户开放政策》(Diplomatic History Relations to Shantung Since Germany's Advent into the Far Eastern Politics to the Close of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斯特拉福德出版社1923年版；谢保樵的《中国政府(1644—1911)》(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编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与政治研究丛书”，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25年出版，1966年再版；吴国桢：《中国古代政治理论》(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ies)，阿灵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魏良声：《中俄外交关系》(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徐淑希：《中国及其政体》(Chin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 A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Reference to Korea, Manchuria, and Mongolia)，牛津大学出版社1929年版；马文焕：《国会辩论中的美国对华政策》(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Debates of Congress)，上海印书局1934年版；伍朝光：《在华传教运动的国际观》(The International Aspect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30年版；李之泰：《孙中山的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un Yat-Sen)，纽约大学出版社1931年版；张凤祯：《1898年以来的中德外交关系》(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since 1898)，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关鲁敬：《中国与国联关系》(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9-1936)，香港亚洲石印局1939年版；崔书琴：《广州—莫斯科协定对孙中山政治哲学和革命方略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ary Tactics)；等等。

② Langer, William L., "Some Recent Book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10, No. 1, 1931, p. 166.

盟和依靠日本之间转换的重要性。^①《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杂志也高度评价了张忠绂的论文是“关于20世纪头20年英日联盟的研究，资料翔实、学术水平高，涵盖了这一联盟的全部历史和重要方面，追溯其源泉，不仅有史实价值更有其现实价值”^②。

论及留学时期张忠绂的治学特点，可以说是延续其导师的特点，从理论及范式层面均接受了其师的外交观念。由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与哈佛大学制度不同，哈佛大学制度近乎英国，重视个别课程及学分，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制度近乎欧洲大陆或者说德国，重视学位候选人对学科知识的全盘了解，这自然决定了张忠绂做研究“注重全盘考虑”的特点。从其博士论文《英日同盟》结构及篇章来看，作者从英日同盟的缘起入手，进而论述战争的演进与英人态度的转变、中英两国政府对于中英同盟的态度、战前日本及英俄两国的关系、战前法德两国与日本的关系、英日第一次同盟、英政府暂取利益均沾政策、日俄战争后英人在远东的态度、同盟条约的签订、同盟条约协定的力量与解释、英日第二次同盟、同盟条约规定的意义、美国在华采取积极政策、日俄第二次协定、欧洲国际外交的革命、英日第三次同盟、欧洲大战与英日同盟、山东问题与日本的密约政策、英日同盟中朝鲜与中国的处境问题、中国反对续订英日同盟、华盛顿会议中的中国、美国的中国门户开放宣言、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上海的演说、日美两国间的冲突、华盛顿会议的四国协定条约的成立以及美国与英日同盟等较为全面的问题，这无不体现了他“综合考量”的治学观。由此可见，张忠绂力求从国际形势下英日同盟的具体形势与转化入手，具体分析中国彼时的外交形势。同时，作者对“一战”后英日同盟的“复活”可能亦做出预测，指出英政府为增进本国商务计，或有与日达成经济谅解之可能，但与日复订政治或军事上同盟，可断言“则为必无之事”^③。此后，张忠绂在《未来的国际形势》一文中更指出“研究国际政治的人，最忌无端。为国家策划外交的人，

① Tyler Dennett, “Book Review: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By Chung-fu Cha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No. 2, 1932, p. 458.

② L. G., “Briefs,” *Pacific Affairs*, Vol. 5, No. 1, 1932, p. 95, 转引自元青、张连义：《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海外评价——以留美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③ 张忠绂：《国际现势与英日续盟》，《时事月报》第11卷第4期，1934年。

尤忌无端。研究国际政治的人，只应当就各种可能的趋势，依据历史、地理、经济与军事推测并预策应付的方策”^①。从上述著作中可见，张忠绂的学术取向深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学术制度“全盘考虑”的影响。

1928年张忠绂获博士学位，并获得华府布鲁金斯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e）基金，担任该研究院青年研究员，任期10个月。作为一名深谙国际外交理论的留学生，张忠绂在学科的探索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独立且中立的外交态度与国际形势判断，他从理论层面反思中国外交障碍及中国外交可能寻求的途径。他深切体恤到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与祖国江河日下的危机感，但亦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当前所处国际关系下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只能是隔靴搔痒。国与国间只有利害关系，恩怨不是影响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在决定外交政策时决不能只顾恩怨，而不计利害。^②如果采用战时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关理论路径来划分的话，张忠绂的国际外交理论介于“理性主义”与“外交主义”之间，在认识论维度上一方面主张国家通过理性地认识国际政治世界，通过规律的发现可以改善社会的道德及国家物质条件，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与外交能力；另一方面主张国家通过综合衡量理性地找到国际冲突的根源，通过国际制度的设计或国际组织（诸如国联）等中间力量的作用，国际社会则可顺利实现如同国内社会的有序状态。^③

① 张忠绂：《未来的国际形势》，《新政治》第6卷第2期，1941年。

② 张忠绂：《英法苏三国协定之我见》，《今日评论》第2卷第5期，1939年。

③ 根据“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模式”，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分为结构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主义、建构主义模式。以下分做详细解释以便理解。（1）结构主义模式：本体论方面主张国家社会结构为主的宏观结构；认识论方面主张机械的反映论；认识者只能适应现实世界，但无法改变现实世界，现实困扰人类的政治问题也极其难以彻底根除；方法论上主张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全球或较大过程的比较、多案例比较、多变量比较和关联性比较。（2）现实主义模式：在本体论方面主张国际体系/国际无政府结构影响的宏观结构；在认识论方面主张机械式的反映论，这种模式提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战争也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方法论方面主张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全球或较大过程的比较、多案例比较、多变量比较和关联性比较。（3）理性主义模式：本体论方面主张以公民、社团或政党的理性选择为单元的方法论；认识论方面主张能动的反映论，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地认识政治世界，通过对规律的发现，可以改善社会的道德和物质条件，从而使社会进步成为可能；方法论方面主张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博弈论。（4）自由主义模式：在本体论方面主张以国家行为及国家的理性选择；在认识论方面主张能动的反映论，人类可以理性地找到国际冲突的根源，通过国际制度的设计，国际社会也可以实现如同国内社会的有序状态；方法论方面倾向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博弈论。（5）文化主义模式：在本体论方面主张公民间或公民社会组织间单位文化的作用；认识论

总体来看，留学哈佛大学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张忠绂重要的学术积累阶段，他试图将域外政治思想引入自身思想体系中。在这一阶段他的学科求索的取向，比较明确地以“采纳西方理论”及“现实应用”为主要特征，试图从理论书本和域外留生活活动、拜师就读中弄清楚中国的外交问题、领土问题、国民问题等牵扯民族神经的一系列问题。从学人身份而言，他在这一时期的学科求索显然处于从“留学生”到“学人”的转变过程中，是一种感性的、初步萌生的学人与学科的交互；从关注取向而言，他对于学科的关注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精神体验，一方面来源于留学时期的理性研修，两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名“政治学”学生初步的学科体验；从学科影响因素而言，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既深受其师韦罗壁外交中立、征引翔实的影响，又强调从中国实际的国际外交形势出发进行理论调和；就自我意识方面而言，他的学科研究初步能够独立自主地以留学生身份对既有研究进行承继，并初步尝试从实践层面对学科进行演练；从学科的情感及归属方面，这一时期他关于国际政治、政治研究、政治学科教学等评价能够不断进行反思性意识，且于“域外”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得到了初步感性认知。

（二）执鞭中土：于“耕读”中锤铸涵融学科

1929年9月，张忠绂归国。据他所称，彼时东北大学在沈阳新成立不久，经费充足，规模宏大，加之自身研究远东关系，而远东问题尤以中国问题为主，中国问题又以东北问题为重，于是接受了东北大学政治系教授教职。遗憾的是，此后他对东北大学官僚气息十分失望，半年后改就天津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后因故辞职。1930年，蒋梦麟以教育部部长身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旧地重游对学校力行整顿，广揽延聘了如陶希圣、许德珩、白鹏飞、陈受康、张佛泉等^①大批知名学者分别担任教授或系主任。出于各方考虑并

（接上页）方面主张建构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方面主张整体与个体之间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特殊案例分析及诠释学方法。（6）建构主义模式：本体论方面主张民族国家间的文化单元作用；认识论方面主张建构主义认识论，作为施动者的国家与作为背景情境的国际无政府结构存在互构关系，这种模式主张要把握国际政治的实质关键在于对国际政治建构过程的理解；在方法论方面主张整体与个体之间的方法论，在具体方法上偏好特殊案例分析和诠释学方法。高奇琦：《比较政治学：学科、议题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3页。

① 钱元强：《留美与近代中国政治学》，见俞可平主编：《北大政治学评论》第5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受其感召，张忠绶于是转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

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史学系合开课程并进行师资共享，使得法政系的教学不只局限于法理层面，培养法政学生一方面在于灌输学生以政治科学之基础智识，训练其思想之缜密、理解之确切，并授以研究学问之经验与方法，使学生能做高深学术之探讨；另一方面在于养成学生应付社会环境之学制与技能，使之毕业后或服务于社会或参加考试，皆能举措裕如，理论与事实并重。北京大学政治系系科门类较为齐全，自1931年起，系所开始添设了行政学原理一课，1932年添设了中国行政制度研究课程，1934年又添设了政治学研究室。就该系课程设置来看，共分为四个大模块：国际关系史（含中国外交史、西洋近代外交史、西洋近百年史、欧洲殖民事业发展史、中日外交史、日本史、中西交通史、西洋19世纪史课程），国际法（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中外条约关系课程），国际政治与外交学（含远东政治、外交课程），国际组织（含国际关系课程），其中由张忠绶面向大学三年级学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外交史、西洋近代外交史、远东政治。^①此后，北大政治系逐步增设行政学方面的课程，这类课程与张忠绶的主持有相当关系，张忠绶也开始担任行政学原理、中国行政制度研究课程的教授工作。^②至1935年前后，张忠绶开设课程多为政体、宪法、议会、政党、行政学原理、中国外交史、西洋近代外交史、远东政治、中国行政制度研究（与陶希圣合开）以及公共行政学等课程。^③人才培养方面，张忠绶主要招收“近世政治史”的研究生，曾担任主科科目的导师，招收有张凤歧、梁骧、徐万军等研究生（1936年因故停招一年），指导科目为国际关系、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④此外，他还于1930年起在清华大学兼课，教授欧洲外交史、行政管理课程。^⑤

① 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

② 孙宏云：《抗战前行政学输入与行政研究的兴起》，《学术研究》2006年第12期。

③ 《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度），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中册 第二卷 1912—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艺、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7、1369页、1371页。

⑤ 金安平：《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1页。

张忠绶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开设固定课程之外，还积极开设公开讲演讲座，面向全校学生宣讲当前政治局势，据现有资料特将其曾受邀进行的讲演整理如下（见表1）：

表1 张忠绶归国后部分讲演情况(1931—1936)

讲演时间	讲演题目	邀请方	演讲地点
1931年10月7日	“对日问题”	北京大学东北同学抗日会	北大讲礼堂
1932年4月29日	“国际政治与中国”	北京大学学生会	北大第二院大礼堂
1932年7月4日	“太平洋上之风云”	北平青年读书互助会	不详
1933年4月14日	“太平洋问题”	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	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礼堂
1935年10月30日	“从二十一条到华盛顿会议”； “太平洋上之国际关系”	河南大学法学院	河南大学法学院礼堂
1935年12月24日	“近百年太平洋上之国际关系”	北京大学学生会	北大第二院大礼堂
1936年4月5日	“1936年的世界国际大势”	北京大学学生会	北大第二院大礼堂
1936年4月21日	“由二十一条至华盛顿会议”	北京大学师生大会	北京大学大礼堂
1936年6月19日	“外交问题”	北京大学女同学会	北大第二院大礼堂
1936年12月10日至12日	与李光忠一同出席美国第一届教育播音会会议	在美国第一届教育播音会会议中根据我国教育部提供的资料，报告中国教育播音事业进展状况	

根据以下资料整理：《可以战矣！》，《北大学生周刊》第2卷第1期，1931年；《公开演讲》，《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10月7日第1版；《政治系布告：本学系国际政治公开讲演》，《北京大学日刊》1932年4月29日第1版；《北平青年读书会主办读书运动周邀请名人公开演讲》，《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7月4日第4版；《冀十七中学请张忠绂讲演“太平洋问题”》，《华北日报》1933年4月14日第7版；《张忠绂先生演讲“太平洋上之国际关系”及“从二十一条到华盛顿会议”》，《河南大学校刊》第89期，1935年11月4日第1版；《编者后记》，《自由评论》第6期，1935年12月27日；《国际大事》，《益世报》（北京版）1936年4月3日第8版；《今日师生大会请张忠绂演讲》，《燕京新闻》1936年4月21日第1版；《北大女同学会请张忠绂后日讲外交问题》，《益世报》（北京版）1936年6月17日第8版；张忠绂、李光忠：《参加美国第一届教育播音会议报告》，《播音教育月刊》第1卷第6期，1937年；等等。

张忠绂在北大任教期间所做的演讲，无一不对国际局势问题有精到的分析，演讲涉及“对日问题”“国际政治与中国所应采取的措施”“太平洋远东政策”“从二十一条到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的外交形势”等主题，重点关注了在纷繁错综局势中对中国有影响的重要问题，如“中日两国政治局势比较”“中东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变化”“华盛顿会议对于远东国际政治之影响”“英日同盟在远东国际政治上之地位”“中日国际关系论”“中国外交政策”等问题，阐释政府外交角逐、外交背景以及各国对华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以上何种主题，这一阶段他关注的始终是国家的主权问题。1930年，张忠绂在《主权之研究：什么是主权》一文中特对国家主权做出明晰，他认为“主权是政邦中最高的意志、最高的权力，人民因而有政治的活动，而后有政治的组织，有政邦，有政府。人民在政治活动方面的最高的意识、最高的权力，就是主权。政府是执行主权的机关，法律是表现主权的工具，主权是人民在政治活动方面的最高意志、最高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是高于人类在其他各种活动方面的最高意志、最高权力……在一个政邦的领土内，政邦的意志决不容许他种团体的意志，篡夺他无上的权威；他也决不容许他种意志平分他的无上的权威。对于国家而言，主权是最高的，他（主权）是唯一的”^①，以此深刻阐述了他的国家主权观。

^① 张忠绂：《主权之研究：什么是主权》，《大公报》（天津版）1930年2月4日第13版。

1932年后，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资助，张忠绶被选为政治系基金讲座教授，并担任北大政治系系主任（1933年至1936年）^①及《外交月报》总编辑。据他称，由于校长蒋梦麟为人办事很有风度也很有担当，因此在北京大学的一段生活，是其精神最为愉快、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期。他认为这段时期“不仅生活自由愉快，应酬不多，而且因领导得人，同事而不同院系者虽交往不多，但无形中大家仍然有一种团体精神，那是极其可贵的”。抗战期间张曾转入政界，称在其服务的机关中，“再没有看见过此种开明的风气。因团体精神的首要条件是领导人必须公正廉明，贪则不能无所蔽，有所蔽则决不能公，决不能明。尤其是，行政学最注重团体精神，以不公正的人领导任何机关团体，那个团体绝不可能有团体精神”，可见北大的教读生活给予了他适宜的治学土壤。

作为专研政治外交的学人，这一时期张忠绶与学科的互动则以“笔杆”为吁求工具，力作频现，著作有《中国国际关系》《欧洲外交史》《美国战前的远东外交》《德意日三国同盟》《演变中的远东国际政治》等（见表2）。其中尤以《中华民国外交史》为代表作，标志着以他为代表的政治学人与学科的互动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以中国外交史为题之代表性著作，除蒋廷黻所著以外，当属他的此本著作最为优秀。该书依张忠绶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期间在校讲授讲义所编，其中一部分已刊载于《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中。基于此，该书上册广泛搜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中各类外交档案，详细论述了辛亥革命至华盛顿会议前后的民国外交情状。著作共分九章，起自1911年辛亥革命，终于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全书凡601页，所叙述民国初年之外交，抄录文件及附注占有较多篇幅，多为原始材料，考证极为详细。^②除此之外，该书的另一特点在于“著述态度可称公允，论断亦多切要”，如言及巴黎和会曰“中国在和会中所提出的具体主张虽大多未能达到，但中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已因和会之经过而引起全球人士之注意，预伏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之处置之张本。中国在和会中，虽未能如愿取消协约及参战各国在华之特殊利益，但德、奥等战败国在中国之特殊利益均已取消，因参战之原因，中国且获得参与巴黎和会并得加入国际联盟为创始成员，是

^①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艺、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139—140页。

以巴黎和会对于中国之处置虽未能使中国满意，但中国已因巴黎会议而获得相当之结果当无异议”，可见其著述态度公允，论断中立。^①就研究价值取向方面而论，其仍然受留学期间导师韦罗璧的学术风格深刻的影响，著述过程强调客观公正，重视历史原料，行文大多旁征博引并附有大量引文及注释，体现出了这一时期他对学科研究理路的坚守。^②

表2 张忠绶归国后教职期间代表作(1933—1944)

出版时间	出版著作	出版社	著作主要内容
1933年	《中国国际关系》 ^③	上海： 世界书局	该书对世界政治与中国、中俄、中英、中美、中日及其太平洋外交政策做出深入探讨。根据在平津各校及学术团体演讲整理而成
1934年	《欧洲外交史 (1814—1933)》	上海： 世界书局	该书共分上下两部，第一部叙述自1814年至1914年欧洲外交形势，论及维也纳会议、英法协商、德意志之统一、近东问题与柏林会议、英法协定与英俄协定；第二部叙述自1914年至1933年欧洲外交在“一战”前后情形，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苏俄之建国与土耳其复兴、国际联盟等。该书籍作为授课课本及参考书，其后附有中西译名对照表便于授课；该著作力求提升读者对国民外交的认识，促进了解国家外交意义是什么？外交政策是否永远不变？外交家的责任

① 陈恭禄：《评张忠绶著〈中华民国外交史〉》，《学艺》第15卷第8期，1936年。

② 桂运奇：《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现代政治学科的建立与初步发展（1898—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68页。

③ 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相关著作，此前尚有顾维钧著“Status Aliens in China”、刁敏谦著“Legal Obligations Arising out of Trea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鲍明钤著“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等，均为留学生在美所作论文。另有圣约翰大学教授McNair将H. B. Morse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三册增删为*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梁璠立：《书报介绍与批评：〈中国国际关系〉》，《外交评论》第3卷第10期，1934年。

（续表）

出版时间	出版著作	出版社	著作主要内容
			何在？外交与军事的关系如何？ 中国在外交上成败得失所在？ ^①
	《英美在远东的平行行动》《四年来的美国远东外交》 《德意日三国同盟》《演变中的远东国际政治》		
1943年	《国际政治论文集》	重庆： 正中书局	汇集了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5年来，作者发表的20篇关于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尤其以中国为中心的太平洋国际政治问题及其演进为重心，其中包括美国由中立与孤立转变为正式参战的过程、英美两国间合作的进展、德意日三国同盟与三国现时处境等种种问题
1944年	《美国战前的远东外交》	重庆： 正中书局	对美国参与太平洋大战对日作战前的远东外交政策做详细解读，其笔调触及美国自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的远东外交策略，并论及美国最终决定对日参战的具体因素

根据以下资料整理：张忠绶：《中国国际关系》，世界书局1933年版；张忠绶：《欧洲外交史》，世界书局1934年版；张忠绶：《英美在远东的平行行动》，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年版；张忠绶：《德意日三国同盟》，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年版；张忠绶：《四年来的美国远东外交》，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年版；张忠绶：《演变中的远东国际》，文通书局1942年版；张忠绶：《国际政治论文集》，正中书局1943年版；张忠绶：《美国战前的远东外交》，正中书局1944年版；等等。

① 张镜人：《欧洲问题要籍提要》，《图书展望》1936年第6期，第34页。关于《欧洲外交史》国内出版著作亦有两种：其一为周甦生著《近代欧洲外交史》（商务印书馆），修订三版，叙述至1925年；其二为吴颂皋著《欧洲外交史大纲》（民智书局），仅出版上卷，叙述外交详细事件至1919年。

综合来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张忠绂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教学科研及著书立说当中，著述与教读齐进，根据北大教学讲习的种种思考推动著述的产生，试图将中国传统知识资源“政治学化”并进而建立相应的本土政治谱系，据他所称“这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一个时期”^①。可见他已从学科思想之维逐步走向了学科学术之维，当然，这一阶段也可谓是学人学术研究从青涩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是政治学人学科求索阶段较为综合升华的时期，有关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及编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喷涌”现象。这一时期之所以成为张忠绂的“高产时期”，成为政治学人在理论层面对学科有着进一步成熟思考的时期，自有其特定的国际社会背景及个人学术经历因素。首先，由于“九一八”国难猝然爆发，国人开始思考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及影响力，并开始试图从外交途径找出国家之所以羸弱的原因，外交值此之际成为牵动国人的一根“神经”，自然给予了政治学人充分讨论的土壤；与此同时，这也与张忠绂对该学科的认识以及彼时资料提供的条件有着联系。由于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外交与中国国家前途有重大关系，但一直以来中国尚无外交史专著，可谓“自《尼布楚条约》至今，凡二百四十七载，即自《江宁条约》至今，亦已九十四年。此数百或数十年间之中国对外关系，国内无详著述信史，即国外专家之著作，其差强人意者，亦不数外交史”^②。于是他决定著述一本专门的民国外交信史。此外，这一现象的产生，还与当时外交系统大量刊布的史料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外交档案已大多公布，为学人提供了著述的客观条件。^③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性，学术研究必然离不开特定的国家主体，而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又决定了学人研究议题的大致分布，同时也决定了政治学人学术的研究领域及关注热点。在早期的学术研究中，宪政、国会、地方自治这些领域的确定主要是由国家的政治危机所决定的，很大程度上仍然脱离不开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④张忠绂则对这类意识采取超然态度，他认为中国应该将提高国家行政效率作为彼时第一要务。

① 张忠绂：《迷惘集》，第99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1页。

③ 朱梅光：《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55页。

④ 刘杰：《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形成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页。

（三）身份转换：以“学”促“政”的互动

觅“政”的人生，除了从学科著述上着手，还与政治学人以“学”促“政”的努力息息相关。这一时期的学科求索，主要以政治学人“起而行”为特征，其求索则关注到了中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问题，不再采用“枯坐书斋，教读演谈”的坐而论道的方式，而是主动投身于国内外各类外交实践活动当中，力图通过一种“设计政治”而达成自身作为政治人理想的路径探寻，实践着自己成为“政治人”的最崇高的理想。虽然早期他一再强调“我未曾加入政界，更不愿营谋，决不肯因做官而求人”^①，但1936年夏后，张忠绶出任了太平洋学会年会中国代表，翌年夏返国。此后又与钱端升、胡适作为代表，赴美进行国民外交工作。^②本次出访希望“一面使美国政府能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政府被迫而抗战的苦衷；一面在加强美国民间对中国的同情，并唤起美国民众对‘二战’国际外交政策有所警惕，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可以有所举动”，同时他计划在华府国会图书馆居住半年搜集相关材料，力图摘录较多国内未见材料，准备休假返国后即开始写作《中华民国外交史》第二卷，并对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第一卷有所补充。^③对此项工作，作者称：“我是学远东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我原有一个计划，想用十年的时间，编成一套五册的中国外交史，以三本记清末，以两本记民国。彼时清华蒋廷黻正‘大事宣传’他正在作清末外交史，因此我决定从民国作起，以便节省人力物力，使读者得以早观全豹。”然而，令他深感遗憾的是，著述材料虽已搜集齐全，但由于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卷草稿无奈遗失殆尽。他在后来回忆中痛心道：“自己的作品无异于自己的儿女，我既无力保护它，虽痛心疾首但也只好徒唤奈何。战后辗转迁徙，既无时间又无金钱，无法再继续完成，也只好留待后人完成。”^④

① 张忠绶：《迷惘集》，第127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出席太平洋学会代表亦有胡适、施博群、许仕廉、沈崑山、秘书刘馭万等，一行人于1936年7月14日乘坐“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启程赴美，同时，胡适此行将参加哈佛大学300周年纪念大会。《胡适赴美，许仕廉等偕行》，《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7月15日第3版。

③ 《中华民国外交史》第一卷叙述至华盛顿会议，并于1936年夏出版，第二卷拟作到九一八事变。

④ 张忠绶：《迷惘集》，第110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此后，张忠绂经常为《独立评论》撰稿，并逐步完成了自身由“学”至“政”的身份转换。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张忠绂对于国家外交、国际关系、各国联盟、外蒙问题、留学教育等问题有着精到的阐述。^①张忠绂尽管自称其身上“有一点不应有的中国名士习气”，但对这项工作仍然“甚有兴趣”。1937年，大多数学人“都以到昆明做学问为荣，以到陪都重庆攀高官为耻（因此与此相对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些教授也大多没有选择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而是依然决定回北平）”^②，但张忠绂却反其道而行之，并没有跟随大多数学人远赴西南联大，而是积极“参政”。对此，张忠绂的解释是：一方面当时已略知众多学人所去的西南联大情形，图书设备绝对不够，研究必根本无法完成，但依据所学可能对国家有点贡献；另一方面虽不热衷于利

① 张忠绂在这段时间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外交关系、英日同盟与德意日同盟、美国与远东政策、国联问题、外蒙问题、留学教育等方面。具体代表作如下：（1）国际外交关系：《近百年太平洋上之国际关系》，《外交周刊》第25期，1934年；《中国与国际》，《独立评论》第133期，1934年；《弱国是否无外交》，《独立评论》第139期，1935年；《未来的国际形势》，《新政治》第6卷第2期，1941年；《秘密外交与公开外交》，《独立评论》第185期，1936年；《中国外交失败的症结》，《独立评论》第148期，1935年；《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周刊》第41期，1935年；《一九三六年国际大势》，《每周一篇》第1卷第19期，1936年；《大战前后的国际关系》，《新中华》第1卷第4期，1943年；《民国二十一条之交涉》，《日本评论》第8卷第4期，1936年；《世界政治与中国之命运》，《南开大学周刊》第86期，1930年；《太平洋风云紧急》，《国闻周报》第9卷第8期，1932年；《民三年山东问题之交涉》，《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5年；《中国战后问题》，《大公报》（桂林版）1942年7月19日第2版；《中国外交政策》，《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月21日第8版。（2）英日同盟与德意日同盟：《国际现势与英日续盟》，《外交周刊》第34期，1934年；《英日谈判的前途》，《独立评论》第242期，1937年；《新约成立的意义》第5卷第25期，1943年；《英日同盟复活之推测》，《东方杂志》第31卷第19期，1934年；《英日同盟复活问题：国际现势与英日续盟》，《时事月报》第11卷第4期，1934年；《为三国同盟事敬告英美》，《大公报》（重庆版）1940年10月6日第2版。（3）美国与远东政策：《美国的远东政策》，《大美周报》第45期，1940年；《欧局与远东》，《经世》第18期，1938年；《英美在远东合作的问题》，《中央周刊》第3卷第10期，1940年；《“炉旁播讲”与外交新政》，《中央周刊》第3卷第27期，1941年；《美总统的“外交新政”》，《时事半月刊》，第4卷第9期，1941年；《最近英美外交之动向》，《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9月19日第2版；《大战的转折点》，《福建日报》1942年4月18日第1版。（4）关于国联问题：《国联的没落》，《独立评论》第201期，1936年；《由“九一八”说到中国与国联》，《经世》第23期，1938年；（5）外蒙问题：《外蒙问题的回顾》，《独立评论》第198期，1936年；《写在“再论外蒙撤治”的后面》，《独立评论》第209期，1936年；《答徐道邻先生关于“外蒙问题的疑问”》，《独立评论》第204期，1936年；《外蒙取消自治之交涉及取消自治前后经过之情形》，《东方杂志》第33卷第13期，1936年；《民国初期之俄蒙古交涉：“中华民国外交史”之一页》，《外交评论》第4卷第3期，1935年。（6）关于留学教育：《敬告今日之学生》，《癸亥级刊》第6期，1919年；《论文明果何物乎》，《癸亥级刊》第6期，1919年；《留美清华学生中部年会报告》，《清华周刊》第24卷第17期，1926年。

② 王波：《大师院落的背影》，《中国青年报》2011年7月20日第12版。

禄，但对于国事与国计民生，亦不能视若无睹。与其在边远的昆明，对抗战的进展挂念焦急而无所知，不如留在政府中，不至于对时局过于隔膜。^①于是，1940年12月，他出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复任外交部参事，1943年8月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长，1944年又被派充为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员，并任小组会议代表。1945年初，复任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提案专门委员。1946年10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顾问兼办事处主任。1947年2月任国民政府文言处秘书。1947年11月，与孟治、瞿菊农、陈之迈共4人作为代表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第二届大会。^②此后长期定居于美国。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书斋生涯之外，张忠绂又以笔为武器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这促使他在更广大范围下进行学科实践活动，履行了战时大背景下作为一名政治学人应尽的学人义务。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并非单纯的学术著述，而多是由政治形势引发的政治思想讨论与政治运动实践，亦十分重视外交对国家的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论断。他指出中国自19世纪以来走上一个“歧途”，即“中国过去的失败，只知有中国而不知有国际，不重视国际关系”，其结果就是中国“丧失了远东主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走入了“弱国无外交”的困境，尤其是中国在与日本当局交往对峙时，往往失去一定的主动性。他认为：“强国固然需要外交，但弱国尤其需要外交。一个弱国被强国压迫、受强国的宰割，而欲靠他国的力量——这在科学昌明的今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愈是弱国，外交愈是重要。强国——尤其是地势优越的强国，他的外交稍有疏忽，尚不至对他的前途发生重大的影响，而弱国的外交稍有不慎，即可招致亡国灭种的惨祸。”^③为此，他特地在《论中国外交失败的症结》一文中举例论证。文中提到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又与中国商谈经济合作。当时的执政者忘却曾经遭受的耻辱而草草同意合作，但最终合作的结果是使中国又丧失了众多权力。在此现实下，“弱国尤其需要外交”，因而主张中国一定要

① 张忠绂：《迷惘集》，第123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国民政府令》，《教育部公报》第19卷第12期，1947年，第3页。

③ 张忠绂：《弱国是否无外交》，《独立评论》第139期，1935年。

重视国际关系，但又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关系。外交与内政相辅而行，内政不修、实力不充的国家在外交上势必遇到种种困难。^①因而，中国的外交，必须靠自力更生，一方面在于增强国内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外交的力量，造就有利的国际环境。^②对于此，他的意见是一个国家如果只顾充实自己的国力而完全忽视国际关系，或过于重视国际关系、过于依赖他国而不充实自己的内政治理，都是顾此失彼的。中国未来的出路应是一面准备充实实力，一面运用国际关系的。^③与他同时期的张奚若亦指出现代国家必须有一坚定的立国理念，所谓“最高明的政治制度乃是民主政治，其使用于‘以理服人’的原则而非‘以力服人’”^④。

值得指出的是，张忠绶在《不安的世界》中提出了建造“强力政府”的具体步骤。“欧战以前大家抱的是‘以战止战’的主张，以为经过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道正义即可伸张，所谓真理也可战胜强权。不幸欧洲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不但使我们明白不能以战止战，反而埋下了下次大战危机的祸端……现时国际政局，因为大家不能彼此谅解，处处都显示着不安的景象，永远和平是谈不到的，目前所谓和平不过是武装均势下暂时的和平。就事实方面说，世界虽大，几无一片安静土。”^⑤他同时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有外交而无政策，无政策则无定见，无定见则无一贯之办法，每逢事变临头，则临时筹划应付方法。因此，中国必须有一强有力牢固的政府，并能保全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性质及领土完整，此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才能维持。若能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远东国际秩序才能得以梳理，太平洋上的和平基础才能得以奠定。换句话说，也只有中国问题得以合理解决，整个太平洋的问题才能得

① 刘超：《“熟悉的陌生人”》，《书屋》2010年第2期。

② 张忠绶：《中国的国际环境》，《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2月5日第1版。

③ 张忠绶：《中国与国际》，《独立评论》第133期，1934年。

④ 张奚若：《我为什么相信民治》，《独立评论》第240期，1937年。

⑤ 张忠绶：《不安的世界》，《北平周报》第62期，1934年。1934年3月29日，张忠绶以同名讲座在北大二院礼堂举行首次演讲，到会300余人，大意谓：“战争决不能制止战争，自欧战之后，国际间因有以战争制止战争之思想，故有国联之组织，目前国际情况又与欧战前相同，处处显示不安，于此普世不安的状态中，尚有两个中心，其不安的情势尤为显著，一为中欧；一为远东……然而，自华盛顿会议后，有九国公约、四国协定，其精神系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而中国开放门户，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破坏一切，并退出国联。若维持公约，则只有施以武力。但俄国正努力完成其二次五年计划，美国亦正进行复兴运动，虽有种种酝酿，亦不过成为军事维持下之和平状态。”《北大一九三六研究会张忠绶讲不安的世界，解释欧洲纠纷症结所在》，《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3月30日第4版。

以解决。^①

从学科研究方面来看，张忠绶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科研主张既放眼全球，又立足国家；视野既宏观，又微观；其研究方法既符合当时综合系统，又贴近现实的研究趋势。从美国远东外交具体政策来分析中国所应采取的应对方式，他指出了美国自中日战争发生以后对远东问题所采取的立场与政策，表面上时而消极时而积极，时而喜谈“隔离”时而又谈“封锁”，时而谈“制裁”时而又谈“报复”，似乎无一定的立场，但实际上美政府对远东问题与态度，则是遵循以下三个准则：其一，谨遵约章，严守信义，并反对单方以武力破坏约章之举动；其二，避免卷入战争旋涡；其三，运用美国的权利与他国合作，以抑制侵略者，而谋求恢复远东的和平秩序，惟此种和平秩序必须建筑于公允而合理的基础之上。^②张忠绶认为，就华盛顿会议而言，美国原为华盛顿会议的召集国，在太平洋上一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的远东政策，一向是主张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与门户开放，而美国是国际中最主张正义、最富有理想的国家。自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历次表示维持其一贯立场。然而，在中日交战之后的17个月中，美国并未采取任何足以压迫侵略者就范的强硬措施行动，反而时有透露出畏怯犹豫的心理。^③中日两国原为同文同种，本应有合作的必要，但两国不安局面的产生一方面由于日本推行的大陆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自身的软弱不安，而二者又互为因果。软弱不安使日本决计推行大陆政策；而日本方面所推行的大陆政策又加剧了中国的软弱不安状况。^④对于这个问题，张忠绶在早期《敬告今日之学生》中，就明确提出：中国处于世界争端之下，理应消除国家主义，保世界大同思想谋人类之共同幸福。自世界有战争以来，损失皆巨，战后之人以国家主义为之，人民各知有其国，而不知有人之国；各知爱其国，而不知爱人之国，于是损人之国以利己之国，夺人之地以扩己之地——然大同和平终归空言，不能见诸实行者也。^⑤

从张忠绶写作取径中来看，此时他对“国家结构”具有明显的思想倾

① 张忠绶：《远东之国际秩序》，《今日评论》第1卷第1期，1939年。

② 张忠绶：《美国远东外交的新动向》，《世界政治》第4卷第1期，1939年。

③ 张忠绶：《英美两国的远东外交政策》，《新经济》第1卷第5期，1939年。

④ 张忠绶：《论中日邦交》，《日本评论》第8卷第2期，1936年。

⑤ 张忠绶：《敬告今日之学生》，《癸亥级刊》第6期，1919年。

向。他的结论是，近现代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并非受外敌入侵，而是国家内部转型及社会变迁步伐快，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却无法跟上，而只有当国家转型、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制度化的步伐速率相对等，即所有社会变迁与国家转型都被适时地制度化了，才不会产生国家危机，或是产生了国家危机后也均能被高效率地解决。^① 他对于国家社会结构亦有相当关注，从社会结构层面入手，指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直接导致了新兴意识形态的崛起，各种政治势力逐渐形成，并与社会变迁相同步，历经了数轮转化及重组，成了影响社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势力。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当中，各种政治势力并存、角逐、构变，既相互影响，更影响即造就着新的社会变迁及其新的社会行为方式。^② 总的来说，在张忠绂著述的“学政”各类讨论中，以讨论国是为主流，在政治价值选择方面倾向于超越决然国民精神的民主政治，其所提出的对日政策主张，并非一般的抽象的国际交往原则，而是以政治学人的学科视角研究外交问题以解决现实问题。从一定程度而言，对日的主张均富有较强的预见性及某种深度理性。在提出对日政策主张时除关注远东政局的变化以外，还强调与英美等主张和平的国家合作抗日，重视国联等国际组织对远东和平秩序的维持功能，同时密切关注日本的内政外交政策变化，谨防中国上当，体现出了外交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以上可见，他的这一分析，不仅在当时，且在当代，也别出一格，颇为新颖。

这一时期，张忠绂对学科的探索实现了政治讨论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其学科理论与国家形态的关系也最为直接，体现出一种“学术逻辑与政治逻辑双重变奏”的特殊性格。一方面，由于政治学长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具有其自身的学术逻辑，发展遵循一定的学术规律，体现着学科纵深立体的发展逻辑，因此随着不断的探索实践，张忠绂对于学科的认识在深层次得到了拓展；另一方面，彼时中国政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即是国家形态的重要体现，其学科发展必然遵循着现实逻辑与国家现实需求，也必然受到彼时现实社会与现实政治的影响。以张忠绂为代表的政治学人，很

^① 塞缪尔·P.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转引自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② 张忠绂：《迷惘集》，第64—65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显然意识到固有书本的政治理论无助于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因而愈加倾向于使中国的政治学科本土化（亦即政治学科的现实实践化）。同时，这一时期对国家政治外交问题的讨论重在理论推导与价值判断方面，且从主要回答“应该怎样”的现实问题的分析规范逐渐过渡到以客观例证及事实判断的实然分析，并尝试回答中国国家政治“应往何处去”等一系列蕴含现象属性的问题。最值得指出的是，传统的政治学是一门关于国家理论与国家制度的学科，即所谓“一切政治学始于国家，也终于国家”（All the political science begins and ends with state），张忠绶对学科的探索在此阶段进一步将传统的政治学延伸至某种“应用的政治学”，将对国家制度理论的政治研究转换至政治行为，如他于1935年冬进入了当局最高层的视野，七七事变后与钱端升一道陪伴胡适赴美进行抗战宣传，1938年春从欧美回国后，又供职于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同年6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与胡适、钱端升一同受征召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与同情。以上种种均体现出了政治学人与学科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不可免于政治、现实、外交、人情的内容，而更是政治、现实、外交、人情的一种相互表达特征。

三、夹缝时代下的觅“政”人生：政治学人及其学科求索的特征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时代。何谓“时代”？何谓“夹缝时代”？这些又体现出了怎样的特质？从学理上讲，对以上这类问题的解答是甚有必要的。“时代”乃为一个古老却又常新的论题，指的是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揭示时代的本质及规律，所谓“时代”既与个体相关但又与一般的时代不同，是对时代问题的一种规律性解释说明。就中国的夹缝时代而言，系以长期纷争混乱之大动荡时代，全球人类，思想冲突，制度变更，各国内而彼此革命，外而连接战争，而个人之渺小，甚显沧海一粟。^① 这一时代的政治学人群体呈现出几类特征：其一，古与今

^①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上册）：万里家山一梦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5页。

相互冲突融合的转型时代下，学人在心理、思想、意识、情绪等层面呈现而出的“无所适从”的感受。“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近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处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①作为一种固有文化现象的表述与现有文化现象表述的“古”与“今”交织^②，传统卫道与现代文明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纠缠缠绕，西潮与东风两者异质特性在广阔地缘中冲突撞击，加之彼时政潮风云变幻的空间背景，多数人不可避免地挣扎于各种夹缝与紧张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试图努力完成身份的转换及个人使命的回归，在时间轴上展开了古与今拉锯之下的自我妥协，显现出一种心境上的“迷失感”。凡此种种外层结构及个人主体的变动性，已非其群体单纯的文化之力所能解决。其二，近代民族国家意识迁变重构过程中，国民意识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之中呈现的国家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冲突，其中交织的中外政治冲突不能够忽视，这在政治学人群体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近代中国，内部朝政更迭，同时于外部受“西风”之肆意吹刮，两种冲突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相互激荡，相互交织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特殊的主体之上，其政治的角力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对汹涌而来西潮的适应不良，更反映了近代中国自身内部思想矛盾日益深化的危机。其三，近代历史时代的局限性，既表现为知识人群体个人生存空间的相对逼仄，又表现为学人往往无法充分表达自身完整观念，从而无法表现个体相对的独立性。这种演变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现代知识人群体自身生命历程发生历史转折的重要阶段，也体现了这种“夹缝”历史空间不断更迭的动态性对知识人群体产生的重大影响。基于此，墨子刻曾将中西方的知识分子相互对照，在他看来，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常常坠落于一种“超现实”的尴尬境地之中，从中衍生而出的奢望与失望，更加印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潮涨潮落的深深无力感。^③

由此而来，则引申出一个重要问题：在“夹缝时代”下学科学人如何对学科进行求索？政治学人如何“寻觅”自身的学术属性、政治属性？政治学

①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1901年6月26日，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朱其训：《文化夹缝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7页。

③ 墨子刻：《政治发展与知识分子》，《中国时报》1983年3月21日第3版。

人的学科实践又呈现出何种特点？学术与政治，是现代社会的景观，本来两者之间是互动互补的关系，然而各自品格不易。学术辗转于科学与论证之间，政治穿梭于利用与反对之间，只有此四者互相织成一张虽错综复杂但又互相平衡的网，才能自有其生命。由于现代政治建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决定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投射到政治学上，更为复杂。^① 具体来看，不同的学人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实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限于篇幅难以全述。从微观到宏观来看，则涉及学人、学科、时代属性三个方面，因此构成了以这三方面为主轴的三个维度，分别为：“学人-学科”“学科-时代属性”“学人-时代属性”，以下试图在文中分述之。

其一，从“学人-学科”的维度来看，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政治学人具有何种特征？近现代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类人？具有何种特征？这无疑是十分有争议的问题，有论者谓，科举废除之后，“士阶层”的逐渐消失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② 但脱胎于士阶层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仍然保留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而此种社会责任感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即会被激发出来，从而大多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阐抒政治士人之意见，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胸怀政治抱负以直接参与国是投身政坛。^③ 显然，在近代不甚理想的社会生态中，将夹缝时代的“出口”寄托于一种不切实际的“书斋谈学”未免显得过于羸弱，于是学人将学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并进而转化成了一种政治资源及政治影响力，即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根基一般是以学术的、文化的、历史的要素为基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是依靠现实政治，其落脚点是直接参与了政治。由此而来，一方面知识分子之于现实的作用与实际有着极大的差距及无力感，也相信这种差距可以得以克服并使之转化；另一方面，以张忠绶为代表的学人，尤其是政治学人在理想主义层面含有一种高度的政治自觉性、政治积极性，即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行动

① 王向民：《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以1930年代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

③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参与倾向，亦可称之为“以学术及政治相糅合的淑世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来自这一学人群体的传统儒家经世精神，以“救世”情怀投身政治以改造污浊沉沦的国度。^①

另外，要解答的是：近现代外交使节是怎样的一类人？所处的地位是如何？这个问题可以从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驻外交使节的组成人员入手进而分析。一般而言，近现代外交使节大多由职业外交官、国民政府党政军要人以及学界名流或著名学人担任，以上三类人员又可分为政体内成员及政体外成员。由于后两者的介入，打破了旧时职业外交官对整个外交界的垄断，产生了外交官人事体系或网络结构的重组。^②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人”深具学术研究与政治功能双重属性，群体性质始终在“知识分子”与“外交使节”之间来回穿梭。因此对于张忠绶而言，首要的职业身份本质是学者或专家，负责现代知识的传承与思想的传播，但以张忠绶为代表的政治学人也多会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一种是思想者，一种是行动者。作为思想者，及作为具有学科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学术为主业，以政治学的理论为“治学”的基础，但政治学学科的特点和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又使他们对政治改造抱有极大的热情，于是不由自主地成了政治学科的行动实践者。^③

两者交汇而出的则是政治活动者身份的多样性。据1935年《外交年鉴》所载国民政府86名重要外交官领事官，其中具有国内外大学教授或研究院资历者达14人，约占总数的16.3%。^④在这部分亦学亦政的群体当中，又分为数类：其一为归国先入大学执教，随后再转入或兼任政经外交，如卫挺生、王化成、陈之迈、时昭瀛等；其二为投身政界，在局势更易之后又返回校

① 许纪霖、宋宏：《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 白杰：《晚清社会变迁与辛亥革命风采——以善耆的政治人生为线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③ 金安平：《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北京大学政治学（1899—192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2页。

④ 岳谦厚：《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园，如浦薛凤^①、沈乃正；其三为供职别处但长期或短期兼任大学教职员者，如唐悦良、张国辉、冀朝鼎、汪世铭等；其四为纯粹的社会活动家，如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等。^②事实上，这四者的界限并未绝然隔阂，民国初年的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具有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教”或是从“学而优则教”到“学而优则仕”的经历，这一转变过程固然反映了科举废除之后“政”与“学”关系的变化，也显示了这一时期读书人在对现实紧张的政治状况之下，积极寻求新角色认同与身份定位的新努力。^③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40年代前后在政府当局行政系统中占有职位的学人有蔡元培、李石曾、罗文干、王宠惠、李书华、丁文江、翁文灏、胡适、蒋梦麟、朱家骅、王世杰、蒋廷黻、何廉、朱经农、张慰慈、陶希圣、吴景超、吴文藻、唐培经、叶公超、张君勱、吴之椿、陈之迈、徐毓楠、钱端升、楼光来、萧公权等。这部分学者作为政学议一体的权力结构类型学人，是现代中国极其值得注意的一大面相。^④从学界名人角度而言，之所以出任外交官工作，并非完全是出于“职业升级”的需要，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身先士卒投入政治，以解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一种情感关怀；从政府方面考量，由于这部分“学人”拥有特殊的身份地位，既有尊荣的学术头衔及求学经历，又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具有与职业外交官、国民政府党政要人相比不具备的优势资源，因而可以借助其各方面社会声誉及学术影响力量，发挥整合局势及重整战时颓靡的人心之效。^⑤

其二，从“学科—时代属性”维度来看，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内在功能，首先应当回应的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需要解决的是

① 浦薛凤对于学者（尤其是政治学者）入仕途，有如下观点：“此批教授投身政界，大抵系属短期性质，及俟服务告一段落，多数仍回大学执教研究与著述。不论从政执教，予均保持学以致用之信念，努力以赴，衷心无愧。”浦薛凤1939年3月即赴渝从政，从此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共7年之久。浦女浦丽琳在其《浦薛凤回忆录》代序中言其“因爱国心切，应国家召，以学者身份从政”。作为当时的知识精英在抗战救亡背景下，投身政界并与政权发生联系，实际上是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及抗战政策在理性上的一种认同。刘宜庆：《浦薛凤与清华学者的从政》，《博览群书》2001年第3期。

② 王振民：《法意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③ 鲁卫东：《“国难”时期学者的两难困境》，《学术界》2012年第8期。

④ 刘超：《民国文化格局中的平津知识界——一项基本性的翻案》，《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8期。

⑤ 岳谦厚：《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国家内政外交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以提供彼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其次回应的问题才应当是学科内部的基本问题。以张氏为代表的政治学人，求学及在大学任教的初期，恰好是“一战”前后，因此学科生命的历程高峰期与世界大战、国际关系呈现正相关关系。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学术讨论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提升国家内政稳定、重振国家外交尊严为研究土壤及理论基础的，正所谓“驾驶学问之舟于国家危难的惊涛骇浪之中”，他们试图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国族基本命运结合起来，从现实中解答理论问题，从而也催生了学科理论研究的发展。因而，同教育学人群体类似，以张忠绶为代表的政治学人学术历程的发展是栖息在大学教职生涯当中，所谓耕读生活促进学科学术的产出，自然学术历程内嵌在了所属学科的发展当中；然而，与教育学人群体又决然不同的是，由于政治学人的学科性质天生与政治相挂钩，意味着政治学人的学术人生必定是与近代中国政治进程紧密联系的。

从中国历史背景来看，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中国人民奋斗史。近代中华民族天朝大国梦碎，尤其是甲午战败后国力衰微，国家处于危难时刻。新旧体制频繁地转换，东西文化的冲突、国权威严的轰然坍塌，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可谓是一“急切时期”。与全体国民相同，学人与生俱来的民族意识在实际上正是构成了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凭藉，贯穿于他们学术志业和思想的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关怀，他们秉持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自然而然承担起“救国于危难”之际的重责进而寻求“中国之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深刻地体现出了传统士大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这种责任意识成为学人群体中最核心的情愫。在此波澜壮阔的背景下，政治学人以笔杆为利器，主动承担起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种种求索也反映出了一种历史理想主义的心态，这种理想主义心态是知识分子身上传统儒家社会道德理想主义与近代国际大势变迁背景相结合的产物，他们倾向于用“此岸的手段追求彼岸的政治理想”，但对中国政治的普遍过于乐观的预估，使得中国的本就复杂的政治情势愈发充满了纷乱。^①

其三，从“学人－时代属性”维度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中国

^① 金安平：《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党政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社会的转型期，新旧思想此消彼长，国际国内形势交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政治、文化的变动。政治学人与学科的互动与政治权力、国家行为、社会意义等重大的时代命题息息相关，存在着权力与学科之间的控制与张力，政治学人很难不扮演“知识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越是有理想有抱负，就越是无法清楚地将两者进行剥离。他们是学者、学人，是政治思想的传播者，但往往又是政治参与者、政治行动者或者职业的政治官僚，在与学科互动的过程中提供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这一现象在政治学者这一群体中就更加难以完全分开，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和转型时期，不同的身份之间会有融合，同时也会有冲突。特别是，由于法政人士其学术志向及学术训练，始终是社会变动的敏感人群，在风起云涌的年代在政治领域弄潮并因此沉浮于世则不足为奇。^①如此而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学人一次次跌入现实政治的漩涡，被政治抛弃而“出局”？是什么原因致使徘徊于学术与政治间的身影既成群体又显孤单？这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历久弥新的话题。要回答这一问题，除了通常所言的“时代趋势”“政学”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在学术上注重的是提高中国学术的品质，在政治上则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会思想的芦苇精神”（指的是“大风刮来”危机时刻关涉“气节”与“情怀”的宁折不弯、屹立不倒的中国士人传统精神）^②以外，恐怕还得紧扣学人与时代背景来谈。^③

在晚年，张忠绂就在其回忆录《迷惘集》中对时代背景描述道：“我接受的教育，从旧式的家庭经过教会学校、预备游学的清华学堂，至若干美国大学，直至念完三个学位为止。耳濡目染，可以说是从最旧的到最新的。教育与环境以及个性联合起来养成了我的主要人生观，和我认为正确的立身行谊之道。线装书给了我初步的人生哲学，西式教育使我放宽了眼界不拘泥于旧社会传统的思想观念。”^④为了深切说明以上学人与近代中国社会背景的交

① 王振民：《法意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

② 陈平原：《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③ 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④ 张忠绂：《迷惘集》，序言第1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互关系，他随之补充道：“我生长的时代中，迷惘的现象不仅限于中国，即世界的情况亦使人迷惘。生长于此一过渡时期内，个体只能就自己的性格、教育、环境等，做出种种抉择。守旧派背后称之为‘洋人’，笃新者又以之为‘顽固’，随波逐流着又称之为乖僻。在此思想庞杂的时期，已无一身行谊的社会标型，也只能行其心志所安。”^①而在思想极端动荡时期，个人处身行谊，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既不能脱俗独立，又不愿阿世取容。脱俗独立，则不入于道，最多也只能独善其身；阿世取容，则不入无学。以学济奸，则危害国家与社会更甚，最低限度亦无利于他人，只图一己享受。以张忠绂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学人无疑生长在中国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由清季、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幼时所受的教育思想是忠君爱国的旧式教育；民国成立以后，因学校教育与环境关系，这部分人思想已逐渐转变。他们生长的过渡时期，内有一个古老的家族，外有一个新兴的中华民国。这一群体熟知个人思想与观念的形成，正是迷惘的根源，在迷惘的环境与世界中，如能仿若柳絮随风，反倒逍遥自在，任其飞上枝头，或堕入泥沼；这一群体若有深刻思想与坚定的观念，则必成为苦恼的泉源。可见政治学人个体其学科求索历程，无疑是在时代夹缝之中求得某种平衡，是一部学人成长与学术养成的纪传记录，必然经过了这种夹缝时代特征下“紧张却又复杂”的心灵体验。

以张忠绂为代表的政治学人，曾反复强调在中国近代特殊的环境中与中国特殊的官场氛围中，“似乎做事者必不能做官，而做官者亦必不肯做事。盖做官者在中国无正轨可循，几于全赖交情与人缘。除裙带关系外，均建筑于忍让与圆滑之上。忍让圆滑之人，只有假公济私而决不肯因公害私。以做事为目的的人却不然，做事则不能不负责任，负责人则不可能完全避免因公而开罪于人，其结果，自然不免于为人所倾轧排挤”^②。他此种“君子和而不同、决不假公济私、不愿苟同”的理念在早期留学阶段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晚年回忆录中对中国留学生兄弟会组织即有论述，多持贬抑之辞：这些组织——“无异于结党营私谋求个人私利而不辨是非，有学生加入兄弟会常有

① 张忠绂：《迷惘集》，第14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张忠绂：《迷惘集》，第197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因利害关系冲突而相互仇视”。善于取巧的人则秘密加入一个以上的兄弟会，以便争取多方面的援引。这无异于是“政客的作风”，在于投机取巧、在于脸厚心黑。很显然，他对于以上此类行为是不屑于参与的。^①然而，究其政治学科的本质，却意味在“君子”与“人情”之间保持两力平衡，在学科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保持平衡，既有对抗也有合作，这就是政治学人异于其他学科学人的“政力相背”。^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治学科在政党政治中的巨大作用是由于它的社会身份及社会品格，而其局限也主要来源于这一群体的社会身份及社会品格。对张忠绂而言，虽曾自称身上“有一点不应有的中国名士习气”，但对从政这项工作仍“甚有兴趣”。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说，则是“做官应做事，不做事又何必做官”，并许诺“人若需要我，而邀我从政，我或尚可能竭智尽忠，为国家社会做点事”。^③然而，他却在事实中不断败下阵来，不得不感叹“做事”显然要比“做官”难，在非民主、非法治的国家中，做事较之做官，其困苦艰难岂仅百十倍而已。^④

因此，抗战结束后，张忠绂也如大多数学人一样长期不得志，继而退出政府，晚年重操教书旧业。他自认为一概疾恶如仇，不仅容易得罪他人，还因做事认真立身处世又不肯随和，且由于生性疾恶如仇，最容易开罪他人，因而注定了“不是做官的材料，至少不是乱世做官的材料，也只能淡泊名利，不与人争权夺利”。此后，即使张于1946年被聘为东北中正大学校长^⑤，但在晚年却又遭遇了政治人生的“滑铁卢”以及官场中的“水土不服”。事实上，无论是以张忠绂为代表或其他政治学人，也均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角色扮演者”，由此政治学人与学科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不可免于政治、现实、外交、人情的内容，而更是政治、现实、外交、人情的一种相互表达。对于这一点，另一位同期政治学家鲍明钤即有阐明，他以“政治运动”说明政治

① 张忠绂：《迷惘集》，第142—144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他在其中例举学生会组织有“F.F.”（发起人为顾维钧等）、Cross and Sword（或称“十字架与宝剑会”，简称“C.&S.”，发起人为王正廷等）以及“A.L.”和仁社等。他对这些留学生社团多有贬抑之辞。

② 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

③ 张忠绂：《迷惘集》，第142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④ 张忠绂：《迷惘集》，第128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

⑤ 《中央社沈阳三日电》，《申报》1946年8月4日第2版。

学人及其学科的关系，他在晚年自述集中指出现代的青年除了应该努力谋求建设新的强有力的政府以及努力谋求国家教育、地方自治、交通的改善之外，重要的是青年还应养成政治精神，尤其是养成政治运动家的精神。应具有政治家公平的眼光、宽大的政治参与态度，像球队的竞争，胜则胜、败则败之精神以作政治运动。倘若政治运动家没有养成如此的精神、如此的运动能力，那么政治运动家的精神养成又该是什么？^①

^① 鲍明钤：《中国青年对于现代国内政治应取的态度》，见《鲍明钤文集》，鲍丽玲、毛树章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